



西南财经大学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硕士学位论文

MASTER'S DISSERTATION

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老人身心 健康的影响

The impact of children's migrant work on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left-behind elderly

学位申请人 黄孟齐
指导教师 毛中根
学科专业 农业管理
学位类别 农业硕士

分类号 _____ 密级 _____

U.D.C _____

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老人身心 健康的影响

**The impact of children's migrant work on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left-behind elderly**

学位申请人: 黄孟齐

学 号: 219095137038

学 科 专 业: 农业管理

研究 方 向: 农村发展和管理

指 导 教 师: 毛中根

定 稿 时 间: 2021 年 3 月

西南财经大学

学位论文原创性及知识产权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因本学位论文引起的法律结果完全由本人承担。

本人同意在校攻读学位期间论文工作的知识产权单位属西南财经大学。本人完全了解西南财经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西南财经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数字化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1、保密，在____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2、不保密

特此声明。

黄孟齐
2021 5 27
学位申请人:
黄孟齐
2021年 5月 27日

摘要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青壮年不断向城镇和非农部门输入劳动力，刚刚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现有流动人口规模达到 3.76 亿。这一大规模的迁移对农村家庭养老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农村养老工作的焦点是提升养老质量和健康福祉，因此留守老人的身心健康问题非常值得关注和重视。

本文在厘清“时间效益”和“收入效益”构成的传导机制下，引入新迁移经济学理论、健康老龄化理论、家庭代际关系理论作为理论支持，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并选取多个健康测度指标，通过区分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日常照料的时间投入和经济支持两种代际转移路径，研究了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父母身心健康的影响。研究方法方面，本文首先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模型，最后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检验。研究发现，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后照料时间减少，父母独立劳务时间增加，对父母的身心健康呈现负向影响，而外出子女作为一种收入转移的经济支持对父母的身心健康有正向影响；总体上，子女外出务工两者效应叠加对父母健康的总效应为负。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启示：首先，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农村青壮年不断向城市转移趋势下，留守老人在子女外出后照料家庭的负担增大对父母健康产生不利影响，需要社会养老作为家庭养老的重要补充。其次，老人的精神健康水平虽然在子女经济支持后有所提高，但它并不能完全抵消照料缺失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且农村老年人精神健康问题越来越严重，无论是家庭养老模式还是社会养老支持都应在改善老龄父母的精神健康状况上做出努力。本文提出了四点政策建议：第一，改善和巩固农村经济发展能力；第二，健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第三，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第四，提高社会政策响应力度。

关键词：外出务工 留守老人 收入效应 时间效应 身心健康

Abstract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1978, young and middle-aged people in rural China have continuously imported labor into urban and non-agricultural sectors. The scale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China can be said to be second to none during the peace period in human history. While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rapid economic growth are at the expense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construction, this large-scale migration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rural family pension pattern. The focus of rural elderly care work i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lderly care and health and well-being. Therefor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left-behind elderly has become an unavoidable problem.

Under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composed of "time benefit" and "income benefit", this paper introduces new migration economics theory, healthy aging theory,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theory a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uses data from China Health and Senior Care Tracking Survey (CHARLS) And selected multiple health measurement indicators, by distinguishing the time investment of migrant workers to the daily care of left-behind elders and economic support, the impact of children's migrant workers on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rural parents was studied. In terms of research methods, this article first performe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n sample data, built a model using ordinary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 model, and finally conducted a robustness test and heterogeneity research. It was found that the care time of rural children after going out for work is reduced, and parents are independent in labor. The increase in time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parents, while the financial support of migrant children as a kind of income transfer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parents; in general, the superimposed effect of the two effects of the children's migrant labor on the total effect of the parents' health Is negative.

Based 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this article draws the following policy enlightenment: First, under the trend of the migration of young and middle-aged people from rural areas to cities, the burden of the left-behind elderly in caring for their families after their children go out has an adverse effect on the health of their parents, and social support is needed as family support. The beneficial supplement. Secondly, although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has improved after their children's financial support, it cannot completely offset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lack of care. At present, the mental health problems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regardless of the family pension model. Or social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should make efforts to improve the mental health of elderly parents.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four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irst, improve and consolidate the capacity of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econd, improve the social pension service system. Third, improve the rural social security system. Fourth, improve the response to social policies.

Key words:**Migrant workers; Left-behind elderly; Income effect; time effect ;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

目录

1 导论	1
1.1 研究目的和意义	1
1.1.1 研究背景	1
1.1.2 研究目的	3
1.1.3 研究意义	3
1.2 现状分析	4
1.2.1 中国外出农民工现状	4
1.2.2 中国留守老人现状	6
1.3 研究方法、目标与基本思路	8
1.3.1 研究方法	8
1.3.2 研究目标	9
1.3.3 基本思路	10
1.4 可能的创新和不足	12
1.4.1 创新之处	12
1.4.2 不足之处	12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13
2.1 相关概念	13
2.1.1 留守老人	13
2.1.2 子女外出务工	13
2.1.3 健康指标	13
2.1.4 收入效应	15
2.2 理论基础	16
2.2.1 新迁移经济学理论	16

2.2.2 健康老龄化理论	17
2.2.3 家庭代际关系理论	18
2.3 文献综述.....	19
2.3.1 外出务工对家庭收入、身心健康的影响	20
2.3.2 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时间分配、身心健康的影响	23
2.3.3 研究评述	25
3 样本特征及描述性统计	27
3.1 数据来源及说明	27
3.1.1 数据说明	27
3.1.2 样本选取	28
3.1.3 变量描述	28
3.2 描述性分析.....	29
3.3 计量分析.....	30
3.4 计量模型及实证分析.....	30
3.4.1 模型结果及分析	31
3.4.2 稳健性检验	32
3.4.3 异质性分析	34
3.4.4 总效应	38
4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39
4.1 研究结论	39
4.2 政策建议	40
4.2.1 改善和巩固农村家庭养老功能	40
4.2.2 健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41
4.2.3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42
4.2.4 提高社会政策落实力度	42
参考文献	44

1 导论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演进过程中，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现象，他们为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做出了极大贡献，但由于中国的二元化社会结构和所处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随迁老人进入城市定居的政策渠道不够通畅，大部分老人只能够留于农村地区，从而催生出了中国“留守老人”这一特殊社会群体。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生活质量的提升，人民的健康意识加强，提高寿命也是全社会全人类的夙愿，而老龄人口又是健康的最直接相关者。因此在当下外出务工人口和留守老人数量都在上升的情况下把研究聚焦在留守老人健康问题上对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有深远意义，同时研究目的也是顺应十四五规划提出“逐步提升老年人福利水平”的内涵。在对以往文献进行梳理后，本文主要关注农村留守老人身心健康与收入、时间分配在子女外出后发生的变化以及影响机制的研究。前半部分主要描述了中国城乡大流动背景下留守老人的现状，同时本章的后半部分对本文的研究机制和方向进行了详细阐述，最后提出了本文存在的不足之处和创新点。

1.1 研究目的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中国是一个人口数量庞大的国度，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达到14117万人，预计2027将达到峰值。根据联合国对老龄化社会的界定，当一个地区总人口的7%为65岁以上老龄人口，该地区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如果老龄人继续增加到超过14%，定义为进入“老龄社会”。我国于1999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2019年末，我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为12.6%，如果以联合国对老龄社会的界定为标准，进入

老龄社会这条分界线只差 1.4%，我国离“老龄社会”只有一步之遥。在老龄社会的即将来临之际，历来作为农村唯一的生活保障的耕地，已经无法提供足够的经济来源支持老人的生存，养老的负担越来越需要年轻人去承担。当前在国家工业化和社会城镇化快速推动的发展历程中，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已经是一种“主流”，一批又一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为了获得更好的经济来源涌入城市。在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中我们看到，2020 年农村户口外籍务工人员数量相比于 10 年前增加了 88.52%，超过了 4.9 亿人口。在国家卫计委发布的 2015 年度《中国家庭发展报告》发现，农村留守老人占农村老人超过 23%，数量逼近 5000 万，在经济加速发展和城乡演进过程中，留守老人群体还在不断扩大。从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可以看到，2019 年农民工数量高达 29000 万，比上年增加 0.8%，到乡外就业农民工 17400 万，比上年增加 0.9%，虽然显示增幅相比于往年有所减缓，但农民工总体人口仍不断增加。中国社会二元化结构产生的农民工是其特殊产物，在中国社会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作为社会发展必然产物的留守老人群体，成为了社会和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由于当前中国还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很多问题还有待解决，农村老人无奈留守于村中，帮助子女照看后代子孙，甚至继续停留于田间，帮助家庭减轻经济压力和儿女负担。年轻人在城市劳务从而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极低的养老成本导致了农村留守老人以自我消耗为代价，在养老环境极差的农村养老，以微薄之力助中国跨越式的发展。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留守老人生活水平低，精神得不到慰藉，身体素质差，留守老人在身心健康上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之一，国家的平均经济能力还未能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各类基础设施还缺乏建设，国人能参与的文体活动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满足不了需求。我国近年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针，政策倾斜向农村，乡村人口的生活条件在逐渐提高。但是由于社会的聚焦点大多集中于进城农村青壮年的生状况或者留守儿童的成长健康问题，留守老人的身心健康状况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和关注。留守老人在老龄群体中的属于十分脆弱的群体，尤其是健康容易受到其他因素影响，需要得到的帮助和支持也比其他群体更多，因此提高留守老人的生活水平和经济状况，对留守老人的身体和心理健康进行扶持，对于帮助城市化进程和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作用。

鉴于上述老龄社会的挑战和留守老人产生的问题，本文对农村留守老人身心健康的研究是有意义的，探究子女外出打工对农村留守老人身心健康的影响，是打开宜居美丽农村局面的重中之重。在中国经济飞跃的时代，留守老人坚守农村，为中国的发展默默付出，探究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的影响也应该成为了学术界应该关注的聚点。

1.1.2 研究目的

本文通过“收入效应”探究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在身心健康上的差异性，并借助“时间效应”分析留守老人的时间分配特征，提出改善农村留守老人身心健康状况的科学建议，为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

1.1.3 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加速向城市涌入，在迈向发达国家行列的经济腾飞过程中，留守老人作为一种特殊群体长期存在。由于我国国土辽阔，社会呈现二元化特征，东中西部发展极不均衡，各个地区人口的生活状况都不尽相同。留守老人在西方社会被称为“空巢老人”。留守老人是中国社会的特殊名词。中国目前的发展更多投向城市和工业，社会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不高，留守老人扶持力度不够。当前农村医疗条件差，救助机制落后，养老体系不健全，对农村群体的生存与发展存在潜在的危机。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甚至有些地区出现了老人无人照顾，居无定处的情况。照这样发展下去，城乡流动速度不断加剧的过程中，留守老人出现各种问题积重难返，有可能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

当下留守老人这一群体在学术界的关注热度不断提高，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留守老人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年龄段呈现出不同的生活状况，导致对留守老人关注的点也不同，大多研究是对老人生活满意度、养老质量，心理健康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所取样本大多只是集中在某一时间截面或某一个地区。在中国传统社会所延续下的养儿防老，多福生子的文化传统背景下，加上

农村养老体系不健全，把热度停留在农村留守老人，研究留守老人健康问题对于社会稳定、农村和谐发展、制定大政方针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2）现实意义

第一，我国虽在消除贫困方面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改善农村人口生存环境、减少患病率仍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本文运用 CHARLS 调研数据，分析子女务工对留守老人的身心健康的影响，测算各项身体指标和活动能力，为改善我国留守老人身体素质提供现实依据。

第二，当下的客观事实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是中国，无论是经济质量，还是国民人均收入同西方老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段距离需要追赶，并且我国距离进入老龄社会近在咫尺，老龄人口将达到新高。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发达国家一般是先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后再出现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而由于中国的经济、人口、政策等原因，现在面临一边发展一边人口老化的问题。我国的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与走在前面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都有着较大的不同，用解决西方国家老龄化的政策与方法去解决中国问题是不合适的。因此，分析中国当下出现的农村留守老人问题，对制定满足农村老年人基本养老需求、促进家庭和谐、稳固社会关系的养老服务决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幼年、青年、壮年以及老年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阶段，在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技术的进步下，人类对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生活幸福感的要求不断提高，寿命也得以延长。于是，“健康问题”也成了当下的热点，越来越多的人们更加在意身体指标的变化，老年人口对“健康问题”最为敏感，解决老人健康问题就成了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客观需要，我们当下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的关心和研究就是对我们未来幸福生活的关心和研究。

1.2 现状分析

1.2.1 中国外出农民工现状

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必将导致城乡人口大规模流动（Vendryes, 2011）。从改革开放到目前的 40 年来，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不断转移到城镇和非农产业，我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动阶段，（Hu, 2012）。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显示 2010 年中国约有 22000 万农村户籍人口外出务工，与 2000 年相比增长了近 83%（Cheng, 2013）。而根据 2019 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9 年农民工总量超过了 2.9 亿人，比上年增加 241 万人，同比增长幅度 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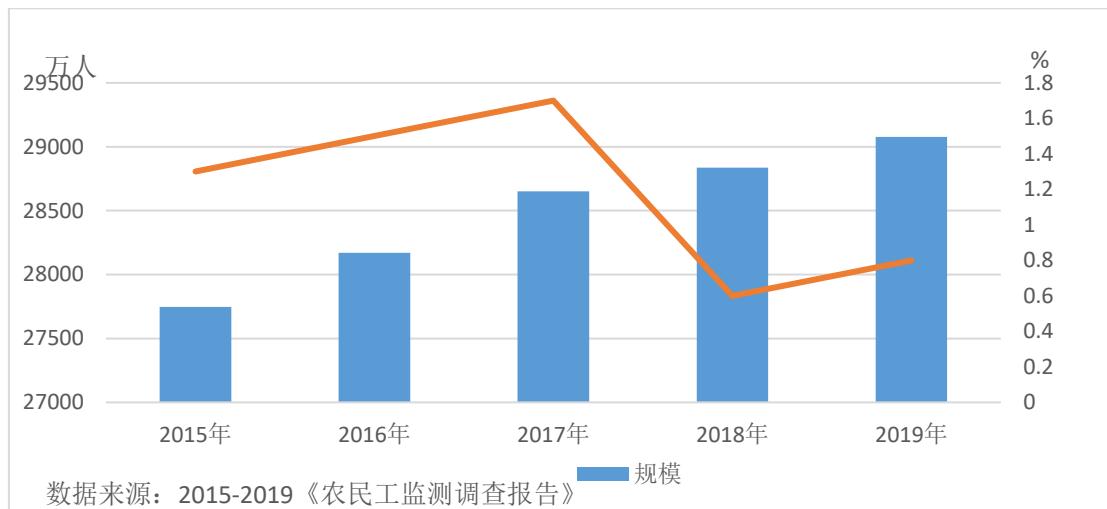


图 1 中国外出农民工数量变化

如表 1 所示，从年龄结构分析，超过总人数一半的群体是 40 及以下的农民工，占样本总数高达 50.6%，同比去年下降了 1.5% 左右；占总人数近四分之一的群体是 50 岁及以上的农民工，占样本总数 24.6%，同比去年提高了 2.2%，并且最近 5 年比例越来越高。

表 1 农民工年龄构成

	单位:%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16-20 岁	3.7	3.3	2.6	2.4	2
21-30 岁	29.2	28.6	27.3	25.2	23.1
31-40 岁	22.3	22	22.5	24.5	25.5

41-50 岁	26.9	27	26.3	25.5	24.8
50 岁以上	17.9	19.1	21.3	22.4	24.6

数据来源：2015-2019《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在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末，在总量上，全国农民工比上年增长 0.8 个百分点。其中，外出农民工超过 17000 万人，同比增长 0.9 个百分点；本地农民工接近 12000 万人，同比增长 0.7 个百分点。从《2017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的数据中可以看到，中国外出农民工历年外出呈现出的增速有升有降，总量上高居不下，仍占相当大的比重，人口大规模快速流动仍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现象，这会延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截至 2017 年，中国人口的城市化率在“民工潮”的涌动下从 1978 年的 17.92% 不断提升至 58.82%（路雅文，2018）。由于中国中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的问题，很多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会去大城市寻找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通过劳动来提高经济收入。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经济增长模式逐步由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变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模式（王阳，2017）。并且从社会发展的公平性和生产效率的角度考虑，随着户籍制度的逐渐消失，城乡人口的流动性将会越来越大。（孙文凯，2018）。然而，由于城乡二元分离的社会结构和自身经济条件的约束，虽然户籍制度逐渐放松了对人口流动的控制，但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住房保障、医疗服务、儿女就学等方面仍面临许多障碍，不能平等享受与城市公民同等的政策待遇（叶敬忠等，2006；李强，2010；郑磊等，2013）。许多外出务工人员不得不将子女与父母留在农村减轻自身生活负担，所以出现了农村留守老人这一特殊群体（叶敬忠等，2009）。

1. 2. 2 中国留守老人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尤其是沿海城市依靠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及政府在政策上优先扶持，推进了中国社会向现代化以惊人的速度迈进。但是中国翻天覆地、日新月异的变化与发展也伴随着新的挑战和困难，经济发展使得南北差异、中东西部差异更加强烈，也导致了留守老人特殊群体的出现。民政部有关负责人根据 2015 年民政局数据表示，目前农村留守老人数

量已近 0.5 亿，由于缺乏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在身体上和心理上都出现了问题，其中 80% 以上的留守老人需要完全靠自己谋生。结合 2016 年全国老龄办相关的统计与调查数据可知，在全国农村区域的老年人家庭群体中，48.9% 均为空巢家庭，共计 3288 万户。在全国范围内 10800 万农村区域的老年群体当中，43.9% 是空巢状态，共计 4742 万人，在某些区域中外出务工的青壮年所占比重已经高达 90%，东部区域的外出务工率水平高于西部与中部区域，超过了 60%。结合国务院所下发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内容可知，到 2020 年，处于空巢或者独居状态的老年人可能会持续增长到 11800 万人，留在家中的老人与小孩长期缺乏年轻人的照顾，尤其是老人还肩负养育后代的责任，让老人更加疲惫，在生活物资上匮乏，精神压力很大，问题重重，应该得到社会和国家的重点关注，社会各界要更多关注这一脆弱群体，同时赡养问题属于社会伦理关系到国家的安定，如果对他们的问题漠视不管，必将积重难返，最后动摇社会之根本。百行孝为先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全社会都应该要高度重视留守老人在身体与心理上的健康。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向城市和非农业部门输入，外出打工子女的支持的同时还需要国家对留守老人问题予以重视才能治标又治本。在绝大部分农村老年人没有社会养老保障的情况下，农村留守老人只能依靠自己多劳多得和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为生。当下我国还处于传统农业阶段，农村地区主要的劳作方式是种植、养殖，但因子女不在身边人力资源减少，老人用更多的时间完成农作任务，劳动强度大。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传统文化观念在发生变化，孝道观念的不断淡化及城市竞争愈加激烈，农村老人得到经济收入变得越来越少。大多数老人还要担负起抚养孙辈的任务，因此，老年人生活相当困难。心理负担重。现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当子女外出务工时，他们都会将儿女寄托给老人，由老人帮忙抚养。照顾后代让劳动变得更加频繁，生活压力增加；在对小孩的教育上，多数老人文化水平很低甚至不识字，能力上无法辅导后代的学习但又担心他们的学习成绩落后，使得产生了心理压力。其次目前农村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农村人口法律意识也相对薄弱，老人对孩子总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担忧，害怕他们出现危险。所以从各方面看老年人对孩子的管理都显得无能为力，增加了留守老人在生活和精神上的负担。当前农村的养老方式是家庭养老，空巢家庭养老功能就被弱

化。农村留守老人，尤其是空巢老人，生活在封闭的农村，当下农村娱乐设施不够丰富，人居环境不够好，老人的注意力更多放在了家庭上，老人的快乐要由儿女提供，子女不在家导致生活乏味，精神状态低下，在家庭之外老人也很难找到精神依靠。由于子女不在身边，对于一些年纪偏大的老人，在日常生活小事上，诸如上厕所、做饭等都成为难题生活，缺乏照料，安全隐患多。留守老人是患病率较高的群体，当生病时候子女不在身边，无人看守，感到很孤独。同时村落各户零星式的居住情况，使得老人遇到生活上的突发问题，更是束手无策。老人患大病、急病得不到及时的医疗救助，健康得不到保障，留守老人的健康问题不容乐观。在各个组织的调研数据中发现，慢性病是多数农村留守老人常年不解决老大难，甚至衍生出很多连带病，导致多病缠身，不断对老人身体产生伤害。子女外出就业的行为固然会提高家庭人均收入，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不断普及下，就医条件有所改善，但就总体来说，医疗、护理、供养条件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为了积极应对老龄社会的到来，分析中国当下出现的农村留守老人问题，满足农村老年人基本养老需求，对促进家庭和谐、稳固社会关系的养老具有重要意义。

1.3 研究方法、目标与基本思路

1.3.1 研究方法

通过文献组合和现实归纳，本文采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理论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采用具有学术认可度较高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8微观数据，以识别子女外出务工对父母健康影响的两种效应：收入效应和时间效应。深度分析留守老人健康状态和时间分配，本文所采用的具体研究方法如下：

(1) 文献研究法

文献综述将重点讨论子女外出工作对留守老人健康的影响，对国内外相关文献和重要理论进行系统的整理和评述。在文献中梳理外出务工决策对老人健康的影响主要从留守伴随的收入效应和时间效应两条传导路径展开，并

对收入效应和时间效应的反向作用机制进行了阐述说明，从而剖析了父母对子女外出务工决策的权衡比较，同时在指标选取上它还为本文实证分析中的控制变量的选择提供参考。

(2) 实证分析方法

本文建立的子女外出务工对父母健康的计量模型如下：

$$\begin{aligned} Health_i = & \alpha_0 + \alpha_1 LnIncome_i + \alpha_2 Age_i + \alpha_3 Marry_i \\ & + \alpha_4 Gender_i + \alpha_5 Edu_i + \alpha_6 Disease_i + \alpha_7 Work_i + \varepsilon_i \end{aligned} \quad (1)$$

$$\begin{aligned} Health_i = & \beta_0 + \beta_1 Time_i + \beta_2 Age_i + \beta_3 Marry_i \\ & + \beta_4 Gender_i + \beta_5 Edu_i + \beta_6 Disease_i + \beta_7 Work_i + \varepsilon_i \end{aligned} \quad (2)$$

其中， $Health_i$ 表示父母*i*身体健康状况。 $LnIncome_i$ 是关键解释变量父母*i*的外出子女经济支持总额的自然对数， $Time_i$ 是关键解释变量父母*i*的体力劳动时间， Age_i 、 $Marry_i$ 、 $Gender_i$ 、 Edu_i 、 $Disease_i$ 、 $Work_i$ 均为控制变量，分别为父母*i*的年龄、是否有配偶、性别、受教育程度、曾患慢性病个数、去年是否工作。 α_0 、 β_0 为截距项， $\alpha_1 \sim \alpha_7$ 、 $\beta_1 \sim \beta_7$ 为待估系数， ε_i 是随机扰动项。

1.3.2 研究目标

留守老人问题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活水平和养质量老两方面，其中包括身体健康问题和心理健康问题。本文在过去的理论、文献、数据、著作中研究和创新的基础上，搭建计量模型探究子女外出务工与父母身心健康问题的因果关系。这主要是为了防止直接的认为子女义务与子女外出直接造成老人健康问题简单的因果关系。本文拟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去说明农村留守老人所面临的身心健康问题：

假设一：留守老人由于得到子女外出务工后的汇款收入提高，经济压力减小，日常负担得到释放，生活水平提高，在衣食住行医各方面条件都得到了改善，对留守老人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产生了积极影响。

子女务工决策对父母健康的深度原因的实证分析，利用 CHARLS 数据库，对老人时间利用等方面进行分析。

假设二：相比于非留守老人而言，由于家中劳动力减少，留守老人不得不弥补劳务缺口，增加家务劳动时间（如：照看下一代、洗衣做饭、务农帮助），导致留守老人在时间分配上不得不减少闲暇娱乐时间（如：睡眠、棋牌游戏），同时由于得不到子女关系与照料，对留守老人身体和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1.3.3 基本思路

本文在分析子女外出务工对父母身心健康产生的影响的过程中通过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在对文献进行查阅的基础上，了解目前国内外留守老人的生存情况和变化趋势，对留守老人健康问题可能产生的原因进行清理，理清传导机制，选择出合适的实证模型，作为后续文章模型搭建的基础，并提供一个基本理论框架作为支持。

第二步，对 CHARLS 数据库中有子女外出务工的农村家庭样本进行选取，提取其中留守老人的各项健康指标，和个体基本特征。利用丰富的数据资源，对留守老人各项指标进行描述性系统分析。

第三步，在第二步描述性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利用第一步选取的模型来分析子女外出务工对父母身心健康的影响。在得出实证结果后在留守老人不同性别、不同生活环境、不同文化程度等角度，对留守老人的健康差异进行异质性分析。根据留守老人出现的问题特点，对出现的健康问题和生活状况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建议。技术路线如图二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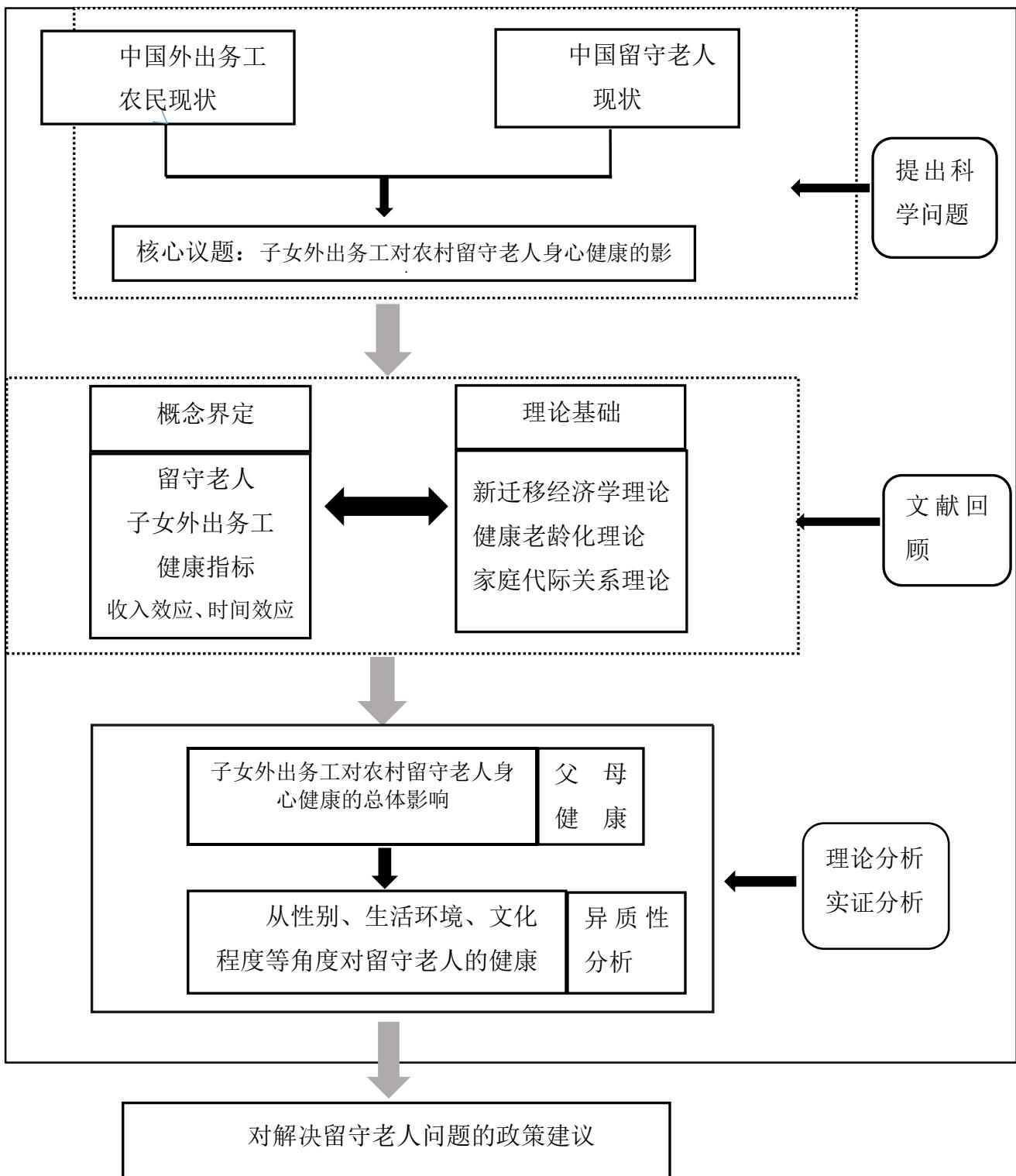


图2 技术路线

1.4 可能的创新和不足

1.4.1 创新之处

本文的创新在于利用 CHARLS2018 最新追踪数据，从代际转移的视角实证的角度揭示了留守老人在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个维度均会受到来着子女务工的影响。本文在参考和阅读大量文献时，对不同文献所阐述的指标和路径进行对比，发现在传导路径上有所创新的文章并没有采用直接性的关键指标，如：（刘畅等，2017）。本文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进，本文利用子女外出务工后将增加留守老人体力活动时间的特点，从时间分配的角度对留守老人健康影响的作用机理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直接利用体力劳动时间这一关键指标，这在现有文献中也较为少见。其次，目前大多数文章利用主观指标，研究集中于生活满意度、自评健康等方面，本文结合主观指标与客观健康指标（生活活动能力、躯体活动能力、患病个数等）对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进行评判较为少见。第三，本文的研究结果对当下中国呼吁资本返乡，优质劳动力回乡，农民工返乡就业，改善留守老人生活环境以及对于乡村振兴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4.2 不足之处

由于 CHARLS 数据库对子女外出务工的时间长短没有进行调查，并且 CHARLS 数据的调查年限跨度很大，所以无法得出外出子女不在家的时间，因此导致本文只能得出现阶段农村父母健康对子女外出务工行为的反应情况。其次，在数据信息等因素的限制下，CHARLS 数据仅仅统计了非家户子女能够给予父母的陪伴时间以及在经济层面上予以支持的相关信息，这致使家户子女对应的收支信息被包括在家庭生活开支这一板块当中。对此，本文的研究重点是非家户子女出现的外出行为与农村区域父母整体的健康情况之间所存在的影响机制。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

2.1.1 留守老人

“老年人”历来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寿命的不断延长而改变，因此对“老年人”的界定从来都没有明确。世界卫生组织（WHO）以及西方平均寿命较长的发达国家对老年人的年龄界定为 65 周岁以上，认为发展中国家老人年龄达到 60 岁及以上的人界定为老年人。在古代中国，将 50 岁作为老年人划分的界限，新中国成立以后，法律规定为 60 周岁（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老年人是指 60 周岁以上的公民”）。我国农村留守老人普遍是指由于全部子女时间半年以上离开户籍地进入城镇务工或经商或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而在家留守的父母。由于 CHARLS 数据库的调查的广泛性，本文也扩大了留守老人的年龄区间，增加不同年龄段的留守老人进行更好的对比，同时参考以往文献如（卢海阳，2014）将留守老人定义为：至少有一名子女外出务工且年龄 45 岁以上即被判定为留守老人。

2.1.2 子女外出务工

在以前大量文献可以看到，子女的外出务工对农村老人的身心健康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在 CHARLS 数据中确定子女是否外出务工的方式是通过询问老人“从事的工作”和“子女居住地址在哪儿”来确定是否外出务工。

2.1.3 健康指标

结合之前文献资料的研究内容与成果可知，如今更多的是借助自评健康（Antman, 2010; Huang, Lian et al., 2016）来映射健康状况，自评健康所具备的特殊优势是其他类型的客观指标不具备的，这样的评价往往呈现出更强的综合性，能够对健康隐私信息予以汇总（Franzini 等, 2005; Hudson 等, 1999; Katz, 1996）。然而上述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其属于主观层面上的评价指标，一定会受个体特征等因素的影响，每个人对健康情况所形成的主观层面上的感受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误差问题出现频率较高（Disney et al., 2006; Campolieti and Goldenberg, 2007）。所以，为了保障数据信息的全面与客观有效性，本文运用客观指标与自评健康指标结合的形式，对躯体活力、日常活动能力（ADL）等客观指标予以引入，实现全面了解健康情况的效果，在汇总结论后，又借助实证分析的方式验证了其稳健程度。相关指标具体如下表 2 所示：

- (1) 自评健康为个体对当前身体的感观，作为当前健康状况的总体评价，包括 5 个选项：不好、一般、好、很好、极好。
- (2)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以评价日常生活所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包括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IADL）和基本日常生活活动能力（BADL）两部分。前者为个体独立生活应该具备的一般技能，如做饭、维持家务，采购、理财及吃药等 5 项活动；后者是个体满足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能力，包括起床、更衣、吃饭、入厕等 6 项活动。
- (3) 躯体活动能力作为评价身体活动机能的指标对身体素质有更高的要求，主要包括负重、慢跑等 7 项活动。在变量取值方面，总体活动能力指标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指标和躯体活动能力指标之和，两者均以相应活动项目的累计独立完成个数进行测度，相加数值越大表明父母可独立完成的活动越多，身体呈现出的客观状况越好。
- (4) 在心理健康方面，本文以认知水平进行衡量，认知水平以短期内所能够记忆的词语个数测度父母的心理认识水平和精神反应能力。一般来说，记忆词语的个数在单位时间内越多，父母的心智和脑力活动能力越强，认知水平越高。

表 2 被解释变量

变量名	描述	CHARLS 编码
健康衡量指标		
总体活动能力	18 项活动累计独立完成个数	DB001, DB004-DB020
基本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6 项活动累计独立完成个数	DB010-DB015
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5 项活动累计独立完成个数	DB016-DB020
躯体活动能力	7 项活动累计独立完成个数	DB001, DB004-DB009
自评健康	1=差; 2=一般; 3=好; 4=很好; 5=极好	DA001, DA002
认知水平	短期内记忆 10 个词语的个数	DC027

2.1.4 收入效应

本文研究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健康的作用机制主要从以下两条传导路径（两个效应）展开，其中收入效应为：

以家庭总体收入水平高低衡量健康水平，留守老人的健康变化受到收入水平的影响。传导机制具而言是将农户家庭作为基本单位，将所有家庭劳动力停留于土地上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子女外出务工可以将农业风险进行分散，作出外出务工的决策。家庭总体收入在子女于二三产业务工增加个人收入后会有间接提升，而家庭收入水平的上升将使得留守老人在医疗获得，基本生活物品购买力上都有提升，改善留守老人的生活条件，进而对其健康产生积极影响。

2.1.5 时间效应

本文研究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健康的作用机制主要从以下两条传导路径（两个效应）展开，其中时间效应为：

以传统劳动参与作为中介，体力劳动时间的长短会对留守老人健康产生影响。子女外出在机制传导过程中产生重要作用，子女作为农村家庭养老的主要提供者和依靠对象，子女是否在家会改变老年人在养老期间的劳务活动的重时长，家庭劳动人口的增加会减少留守老人的劳动时长，有利于老年人

的健康发展。相反，年轻人外出务工将两代人在情感枢纽上拉远，地理位置上产生分离，使留守老人不得不弥补年轻劳动力流动的导致的劳动力缺口，成为农业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子孙后代的照顾有时也需要老年人照顾，加重了对留守老人的健康的不利影响。

对上述情况的分析，本文的研究框架如下图所示。在图的上半部分，以家庭作为基本单元，当作出子女外出务工决策，父母给予精神上的支持可能还会提供初始迁移资金，子女务工取得的经济收入以汇款等形式反馈给家庭作为回报，对留守老人的健康产生影响；其次子女作为家庭劳动的重要提供者外出后，使留守老人不得不弥补更多的农业劳动时间，导致休息娱乐时间减少进而对留守老人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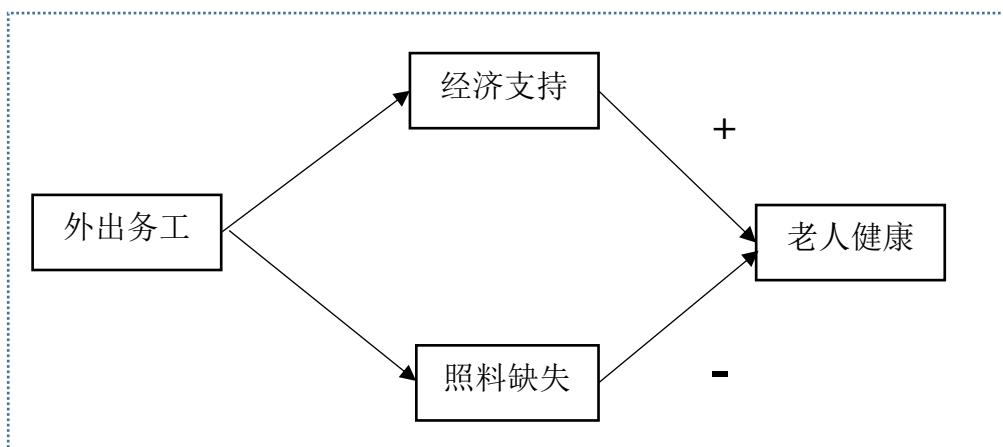


图 3 传导机制

2.2 理论基础

2.2.1 新迁移经济学理论

以刘易斯（1954）为代表的古典主义劳动力迁移理论是早期关于迁移经济学研究开展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托达罗（1969）在研究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中发现二元经济理论没有注意到人口增长临界、城乡之间生产力差异等问题，并提出了三部门模型，认为城乡工资差别也会影响劳动力迁移的动

机，而预期收入的估计受到城市经济部门存在的失业率以及工资差异将影响劳动力的影响，由此影响着人们的迁移决策。古典主义劳动力迁移理论没有考虑到迁移成本，迁移决策和其他影响因素对迁移产生的影响。此后 Stock、David 等学者（1997）提出了新迁移经济学理论，并在两个方面进行了重要的补充：一是在迁移决策上，个人行为决策会扩散到家庭集体决策，并且集体行为会对个人的行为决策产生影响。Stock 认为，群体中的个体不断将个人收入进行横向比较，这种比较会对个人认为收入较低个体的心理产生压力和负效应，进而影响到个体的生活满意度。群体贫富差距越严重的群体中，收入相对较低的个体提高自己收入欲望越强，提高预期迁移动机也就更高。从家庭层面来看，以家庭为组成单位，遵循实现家庭收益最大化原则共同决策成员外出务工，并对成员迁移行为提供起步资金，当成员在外赚取更多收入以后通过汇款的方式对家中经济提供支持作为回馈。其次在迁移的目的上，迁移行为可以分散农业弱质性带来的风险。对于一些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来说，金融制度不健全，市场不发达，无法通过各类金融产品分散家庭所面临的风险。而农业部门是“靠天吃饭”的部门，自然灾害、天气状况等不确定因素都会影响农业部门的生产发展，单纯的从事农业生产弱质性较强，并且农业具有“谷贱伤农”的特点，进而导致家庭农耕收入在粮食减产或者增产情况下都有可能产生损失，因此农村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减少停留于农业的劳动力分散了家庭风险，二三产业获取收入上的提高将降低因粮食减产造成的损失。

2.2.2 健康老龄化理论

如何提升老年人群养老健康质量这一话题早在 1960 年就成为了发达国家研究的焦点。健康老龄化最早是由欧洲老年医学界提出的，国际社会在此之后又丰富了健康老龄化的内容。上世纪八十年代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上，主要课题针对健康老龄化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在 1990 年健康老龄化作为应对老龄问题化的解决方式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老龄大会上被确立为重要举措。1993 年“健康老龄化以科学服务”的概念作为第十五届国际老年学会议的大会主题。“健康老龄化”的概念定义为：老年人应该处于最佳

状态适应生理、心理以及社会带来的变化。同时健康老龄化理论认为在社会的帮助下，个人要适应生理老化，无论是在家庭环境还是在社区环境都需要老年人具备良好的应对能力和保持动态的变化。将影响健康的良好因素进行加强，以健康老龄化目标。比如说，青少年时期的生活习惯、生活环境以及影响健康的事件通常会决定老年时期的身体基础。改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也是实现健康老龄化的重要途径，老年人通过改善当下生活环境可以更好的适应由于身体老化、心理脆弱以及社会适应能力的提升。家庭环境是影响健康老龄化非常重要的因素，和谐的家庭氛围是健康老龄化的实现的必要条件，健康老龄化的实现离不开稳定的家庭结构和良好的代际关系。而在国内，基于当前国情我国老龄化问题蔓延，健康老龄化的重要性也被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和学者意识到，针对我国老龄人特点进行健康老龄化的界定和问题的解决展开研究。1995 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老年医疗保健研讨会，中国老龄委、中国老年学会和国家卫生部医政司共同参与健康老龄化问题的讨论，会议主题确立为《健康老龄化的科学涵义和社会》，专家邬沧萍报告指出解释“健康老龄化”要从六大方面：老年人寿命质量提高，人口年龄结构实现健康转变，健康预期寿命（Healthy Life Expectancy）延长，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全方位引入健康的概念。探究老年人群健康影响因素和趋势变化，认识到健康老龄化的重要性，普及健康老龄化是全社会的夙愿。

2. 2. 3 家庭代际关系理论

家庭的代际关系指的是在家庭内相互之间具有姻缘或血缘的不同辈分之间进行的交换及其动态关系。这种隔辈交换的实际目的在于代际间共同分担风险或者说共享资源。杨舒（2018）研究中提到，1970 年西方提出经典的“代际理论”，它对家庭代际团结进行了六个方面的概括，包括结构性、联系性、情感性、功能性、规范性和一致性。在国内，姚远等(2001)较早开始了家庭代际关系理论的本土化研究，并提出一系列著名理论，主要包括社会交换论、反馈论、生产方式论、经济交换论、依赖论和责任内化论等。其中较为具有代表性的有反馈论、代际交换论和责任内化论。在国内对农村养老的研究中反馈论是重要基础理论之一。费孝通先生于 1948 年指出传统中国家

庭成员之间的双向关系，在子女处于未成年阶段，父母有责任和义务对孩子的成长和教育进行呵护和管理，当父母年老时成年子女反过来负有赡养的责任和义务。熊跃根（1998）提出传统社会流行的“养儿防老”观念的根据既是代际交换体现出的付出和获取的平衡。张新梅（1999）认为代际交换理论可以分为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从经济理性人角度出发经济交换理论认为家庭代际支持相当于一种投资，投资的目的是获得未来的回报。而社会交换理论则是将家庭的代际支持作为家庭成员之间的互惠行为。姚远（2003）又提出，传统中国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责任内化论认为子女和父母的相互扶持就是儒家文化的体现，不过责任内化论认为子代对亲代的赡养行为更加重要，认为子代对亲代的赡养是每个人道德中必要的品质。

2.3 文献综述

不同的代际转移路径下形成的传导机制使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老人健康产生什么影响是不同的。从以往文献中可以就看到外出务工对老人的健康影响各学者展开了长久的讨论，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父母总体健康状况产生的影响是正向还是负面现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观点。当前我国农村养老仍然以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为主，保障体制还不能够满足农村老人的养老需要。在传统形式的家庭养老机制当中，成年的子女往往是对老人予以赡养的关键责任人，也承担着相应的法律责任。（Attias-Donfutetal., 2005; Eric, 2007; 王萍、李树茁, 2011）等人表示，子女对老人的照料所形成的影响作用是运用两种不同的代际转移形式实现的：经济上予以的支持与生活上所投入的照顾时间。老人主要依赖经济支持和儿女陪伴安度晚年，其中，经济支持主要是指子女通过提高现金或汇款等方式为提升老人的购买力以及直接提供实物的行为；生活照料的时间投入主要包括子女在家为老人分担家务、照顾日常起居，以及两辈心灵沟通等方面付出的时间等。但是由于赡养关系中主、客体发生位移导致空间分离，传统的家庭养老发生了变化，使得农村家庭青壮年劳动力在家庭代际转移中产生作用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一方面在经济上，（叶敬忠、贺聪志, 2009; Lu, 2012）表示子女外出务工之后会强化在经济上的支持，在收入水平提升后，运用现金或者汇款等不同的

方式对留守在农村区域的父母予以经济上的反馈，随着家庭总收入水平的全面提升，父母自身的健康水平也会得以提升。另外，（杜鹏、丁志宏等，2004）表示在农村子女外出务工之后，家庭劳动力呈现出匮乏的状态，子女对父母生活上的照料时间会大幅度减少，父母作为主要劳动力承担各项劳动的时间增多，对父母的晚年生活和健康水平都会产生负面影响；总体效果上讲，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对父母健康的影响的总效应由以上两种代际转移方式产生的效果叠加决定。

2.3.1 外出务工对家庭收入、身心健康的影响

从国际视角来看，由于西方社会的医疗条件和养老体系相对完善，子女外出务工对老人生活状况的影响相对较小，人口移动也趋于稳定，因此国外学者对“空巢老人”的研究近几年并不多见，国外在针对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在身心健康方面的影响的研究主要有以下：

大部分学者认为子女外出后将获得更高的收入，个人经济能力的改善会给留守老人给予经济上的回馈，留守老人在经济上更宽裕，物质水平得到改善，提高了生活水平。Hernandez、Zuniga(1994)在墨西哥所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老年人对子女在经济层面上予以的支持十分重视，其直接影响着家庭的稳定程度，外出务工在一定程度上能使得老人获得更多的经济层面上的支持，因此，部分老人会积极鼓励子女外出务工。Demurger(2016)研究了父母在得到外出子女汇款后是否会影响其消费方式，研究表明父母在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后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都得到提高，对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品质的追求有所提高，有利于健康的发展。Song (2017) 利用 1997-2006 年间四期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对留守老人的健康进行跟踪，在衡量健康方面选取自评健康作为关键指标，研究表明父母的自评健康水平会随着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出现恶化，并且外出时长的也会对健康产生不同影响，长期外出子女较短期外出的子女会给父母的健康带来更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Cong (2011) 等人利用 2001-2003 年安徽省 1126 名 60 岁以上老人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对中国家庭的代际“互惠模式”进行了总结，他们认为父母会在后代照料、家务打理上为子女分忧，而外出打工的子女对最初离家决策支持

的回馈和承担赡养责任会提供给父母更多的经济资助。Knodel (2007) 等剖析了泰国的实践案例，研究了收入与老年人健康状况之间的关联性，结果显示随着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在某种程度上，父母的物质条件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改善，所能享受到的医疗品质有所提升，这会对老人健康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Hadi, 1999; Adhi-kari et al., 2011）通过研究发现营养摄入会伴随收入的提高而增加，于是根据此类研究有学者认为：（Brazier 等, 2002; Thomson, 2008），居民收入和健康水平之间呈线性正相关。Kuhn (2011) 等人观测了迁移率这一问题，研究结果表示印度尼西亚区域的留守父母健康情况与成年居民在国内区域中的迁移率之间呈现出正比关系。结合墨西哥的相关研究成果，Frank 等（2009）表示，医疗服务的获取概率与家庭收入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在留守父母收到来自子女的经济支持后，寻求医疗服务与帮助的频次有所增加，这对留守成员的健康状况形成了积极的正面影响。世界上移民率最高的地区是摩尔多瓦，Gassman(2013)对摩尔多瓦进行了调研，发现有一名子女外出务工都会对家庭父母 BIM 指数和健康评价产生良好影响。也有学者的研究具有完全不同的结果，Skeldon(2001)对我国香港等地区的留守父母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子女外出并没有给予父母经济支持，甚至减少了与父母之间的联系，生活条件愈发恶化，出现贫困化问题。Vulletari(2008)在阿尔巴尼亚的研究发现，留守老人在子女外出务工后并没有在物质或者经济方面得到支持，在没有其它收入来源的情况下，生活拮据，靠吃剩饭剩菜维持生计，营养摄入严重不足，严重损害了老人身体健康。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留守老人群体呈现出的特征在全球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具有独特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方面与其他国家(地区)的情况不同的是中国大量的流动人口主要催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浪潮。另一方面，户籍制度作为中国二元结构的核心又限制了农村人口市民身份的转变。其次，城乡户籍制度导致农村户口的人员与城镇户口人员在诸多福利政策上有区别，如子女教育、政府保障房、医疗保障等，户籍地的不一致导致流动人口不能享受当地的待遇。不同的情况和发展阶段导致了中国中国留守老人与其他国家(地区)的不同，存在一定程度的特殊性。根据杜鹏（2007）、闫萍（2007）的研究结论，有家庭成员在外务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留守老人

的经济条件，外出子女和留守子女相比，其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明显更高。根据詹鸣（2006）的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是农村家庭的留守老人支持其子女外出务工，原因在于外迁的子女可以为农村留守的老人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经济补偿，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有积极的“正效应。”根据贺聪志（2009）调查可知，大约 60% 的农村留守老人认为外出务工会影响家庭的生活质量，如果子女不外出，自己的生活状况可能会变差。卢姿潼（2019）的研究表明子女外出务工汇款给父母，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家庭收入水平，提高了物质生活水平。宋月萍（2014）在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生活质量的影响的研究发现，留守老人在得到子女外出务工汇款后，不仅身体变得健康，精神状况也愈发不错，还指出对老人而言精神上的愉悦可能比身体健康更加重要。刘晓昀（2010）的研究结论表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的行为对农村留守老龄人口的总体健康水平产生显著影响。兰永生和王小龙（2011）在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对老人的影响中发现留守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随着家庭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得到改善。罗敏、姜倩等人(2011)做了更细致的研究，认为留守老人的健康会受到来自性别、外出务工子女的数量、居住方式(是否有子女共居)的影响，独居的留守老人健康问题较严重。罗芳和彭代彦（2007）在湖北三市农村地区进行了实地调研，基于回收的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经济传导机制路径会对农村留守老人生活产生积极效益，但年轻劳动力的外出对农村老年人产生的总效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影响很难做出一个准确的定论，不同经济条件的家庭会做出不同的决策，经济条件相对不好的家庭，子女进城务工可能会对留守老人基本生活状况有改善，相对于经济条件宽裕的家庭，是否外出务工便显得不重要。王全胜（2007）认为留守老人的生活经济状况不会被外出务工的行为所改变，并且可能产生负的影响，同时指出子女对留守老人的经济支持具有不稳定性和差异性。

此外，心理健康也会被子女外出行为影响。首先外出务工使得与老年人分离，聚少离多的相处模式不利于留守父母的心理健康，使得留守父母容易在精神产生孤独寂寞感。同时随着外出子女收入回乡金额的提高，老人的心理认知、幸福指数提高。刘美萍（2010）认为人类作为一种群体动物需要其他人的支持和语言交流，老年人如果长时间独自生活，就会导致对生活方向的缺失，在心理上出现各种病症，主要表现有思维混乱、孤独难耐等。邵德

兴（2011）研究发现虽然当下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现代通信娱乐工具不断普，但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代际联系仍然较少。虽然心理健康是间接对老人身体健康产生影响，但是可以从侧面看出老人对目前生活的满意度（Xie et al., 2014）。（刘宏、高松等，2011；He et al., 2016）认为父母的心理健康也是总体健康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衡量子女的代际转移整体效应时，应将心理健康指标和身体健康指标综合起来进行评判。

2.3.2 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时间分配、身心健康的影响

从时间分配的角度去探究留守老人受到的影响上相关国外文献较为少见。大部分提出家庭劳务时长的文献主要关注留守老人在子女外出后的劳动供给变化或留守家庭劳动供给形式，并没有延伸到对健康的作用，只有少量文章聚焦于子女外出决策通过劳动反映对老人健康会做出怎样影响。

Kaneda(2006)分析农村不同性别老人发现，女性的时间分配对子女离开更加敏感，在无子女照料的情况下，女性会首先为家务担当，身体健康受到负面影响相对于男性更高，生活质量水平下降更为显著。Zimmer(2007)在泰国和柬埔寨的研究发现，子女留守个数对留守老人的时间利用产生影响，在有子女外出务工的家庭中只要有一个子女留乡照料父母，为老人提供日常生活帮助减少老人劳动时间，都不会对老人身体健康产生影响。Hugo (2001)研究结论表明，子女外出务工将导致对农村老年父母在生活照料上时间缺失，潜在家庭供养人数的减少，养老质量的降低，使得农村老年人养老福利和身体条件恶化。John Giles、牧人（2005）指出农业生产是对身体素质要求较高的生产方式，因此停止田间劳动力输出可以被视为上年纪的人享受养老福利的一个显示性指标。如果继续从事对体力消耗较大劳动他们很可能出现机体劳损，健康问题引发的可能性将增加，从而使得老人晚年的养老质量降低。Benjaminetal (2000) 发现在绝大多数农村老人在过去没有能够积累起物质财富为自己养老，没有退休金的情况下农作可以为他们的老年生活提供物质保障，所以，为了生存农村老人在晚年不得不仍然参与劳动，很少能够参与休闲，享受退休生活。

受限于微观数据库，国内对留守老人时间分配研究的文章并不多见，过往相关文献的实证分析大部分都选用了 CHNS 数据库，在务工决策对留守老人时间分配影响上结论较为一致。穆光宗（1999）发现子女外出离家就业后，由于父母得不到子女的时间支持可，体力劳动负担增加，精神压力加重，父母的身体健康和生活幸福感必然受到影响。畅红琴（2009）调查研究了农村区域的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外地与留守老人在时间上的分配之间所存在的影响机制，表示随着劳动力外流水平的提升，留守老人用于农业劳作的时间会呈现出提高的趋势。庞丽华（2003）根据走访 60 个村庄所采集到的 1200 个农户调查研究样本对有家庭成员在外务工的和没有成员在外务工的农村老年人口每周的劳动时间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没有成员在外务工的农村老人相较于有家庭成员在外打工的农村老人的农活劳动参与度明显更高，但是该实验的局限性是单单只考虑了在外务工子女失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杜鹏（2004）利用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在安徽实地调研数据进行分析，表明留守老人的家务劳动时间和农业劳动时间都有所增加。白南生（2007）利用安徽省三个村的调查数据，同时考察了“子女外出意愿”以及“子女务工产生的转移收入”对留守老年人在劳动时间分配上发生的变化，实证结果表明，在正负效益相抵下，家中子女外出务工使得农村留守老年人的农业劳动参与率提高 5.8%。卢姿潼（2019）认为家庭劳动力外流具有两面性，当子女长期离家务工，农村留守老人不仅在精神疏导和日常生活照料缺少外，还将承担剩余农业劳动，对身体健康影响很大。左冬梅、李树苗（2011）的研究发现家中子女缺失劳动力减少加重了农村留守父母的负担，加上照料孙子女的劳务，严重影响了老年人的养老质量。李琴（2011）分析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对老年人家庭农业劳动时间的影响运用了 IV-Tobit 模型，结果表明：在“时间效应”传导路径上的影响非常显著，在整个影响效果中处于主导地位，家庭劳动力的缺位在显著增加了农村老年人劳动时间。孙鹃娟（2006）认为，由于老人与子女两地分居，空间分离导致农村留守父母要得到外出务工子女的生活照料变得困难；另外，家庭年轻劳动力的减少也使得留守父母不得不承担在农业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上投入更多的精力。罗芳（2011）研究发现农村家庭中常出现年轻劳动力外流现象，进而导致家庭的劳动供给结构出现变化，致使家中老年的劳动时间增长，很多

繁重的家务劳动与农业生产事宜均由他们完成。根据 2005 年开展的 1% 人口抽样调查结果可以得知，有家庭成员在外工作的农村家庭，老年人每周的农务时间长达 15.38 个小时，相较于没有家庭成员在外务工的农村家庭，每周平均务农时间多 1.65 个小时，同时大多数外出务工者会将子女托付给老年人监护，更加增加了老年人花费在家庭事务的时间。卢海阳（2014）发现务工距离和外出时间与父母参与农业生产具有正相关的关系，子女务工时间越长，距离越远，父母参与劳作时间越长，严重影响老人身体健康。张驰（2020）子女外出需要就业机会一方面会产生“收入效应”，这对父母健康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分离效应”使父母劳动量增加，获得的生活照顾和精神支持减少，这对父母健康产生消极影响。

综上所述，子女外出务工行为对父母健康状况影响的效应与代际转移过程中的时间、收入效应对应的强度存在直接关系。若是外出务工子女获取的收入所产生的正效应与时间所产生的负效应更强，对父母健康状况的影响作用便是积极的；相反，则会产生负面影响。

2.3.3 研究现状评述

留守老人具有脆弱、敏感的特殊性，这一特殊群体需要国家重点保护。留守老人在国外也叫“空巢老人”，这一群体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相比于国外，国内更加关注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健康问题，在实现城镇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许多国家都不可避免遇到这一社会问题。在不阻碍人口转移的进程下，如何维系好两代人甚至三代人之间的关系，在子女经济收入提高的同时又提升留守老人的生活幸福感是非常值得当下社会深思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未来如何建立完善的农村养老体系研究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身体健康的影响的意义非常重大。对发达国家而言，我们国家在养老方面建设时可以借鉴和学习他们的研究和成果以达到进步和超越。

目前，国内外对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健康影响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的影响不是单方面引起的，应该是多方面的结果，甚至是互为对立的。这主要体现从两个途径产生影响：劳动力转移主要在两个方面对留守老人产生作用。一方面，家庭中农业收入的不足

被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后获得较多的非农收入所弥补，消费能力上升，提高生活水平和医疗及时性，对健康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家庭成员长期远离农村直接减少了家庭可支配农业劳动力，老年人的劳动重要性提升，老年人农业生产的边际产出增加，闲暇时间成本上升，迫使老年人增加农业劳动时间，对老人身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前者是农户总收入提高的收入效应，后者是时间效应。

通过整理和学习国内外文献，可以发现现有研究多数从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的生活质量、生满意度、心理、生理和劳动力供给等多种细分视角短期影响出发，对留守老人在留守期间受到的总体效益结论不一，之所以出现这种问题，是由于如今的研究往往忽视了劳动力流向城市区域这一问题会从不同的维度上运用不同的机制影响父母自身的健康状况，不同传导体系对应的影响作用存在一定差异，影响效果是不同维度上影响作用的相对叠加。上述问题依然需要借助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研究来获取更深入的结论：站在传导机制上进行分析，子女外出务工对父母健康情况的影响作用是借助何种渠道进行传递的？父母自身的特征是都会影响作用机制与效果？子女外出务工这一行为往往会在运用不同的途径对父母健康情况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不同影响作用方向或相同或相反，若是不对其进行细化处理，对父母健康状况所产生的影响作用可能无法清晰地被梳理出来。所以，需要同步梳理子女外出务工行为对父母健康情况的影响作用机制与作用的具体方向。

3 样本特征及描述性统计

本章对 CHARLS 以及论文选取的相关变量进行深入描述后，将重点放在留守老人的健康状况的描述性统计，具体而言，它主要包括留守老人患病个数、活动能力等身体指标的变化，留守老人心理健康变化趋势、时间利用变化以及留守老人子女的基本情况。

3.1 数据来源及说明

3.1.1 数据说明

本文所采用的样本数据是选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这些追踪调查样本数据的来源非常广泛，包含全国各地，根据多阶段分层抽样的取样方法，PPS 抽样方法运用于县城/区以及村居数据抽样阶段。目前的调查地区包括我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的 150 个城镇和 450 个的社区（或农村地区）。数据库的研究对象是老年人的健康问题，该调查从居民退休前就开始追中观察，主要选择 45 岁及以上的中老年人（包括其配偶）作为数据样本，采用隔年追踪，每个一段时间就加入年轻化的样本数据。实验的样本数据包括研究对象及其家庭成员的个人基本信息，比如身心健康的状况、家庭人口、就业与收入的情况、社会保障情况等，对心理学、经济学和医学等方面均有所涉及，更加关注宏观经济、社会保障制度等国家政策对老年群体的影响。2011 年 CHARLS 展开全国范围的基础调查，追踪回访的间歇时间一般定为两次，2013 年进行全国追访时，该样本数据已包含有 1.24 万家庭的 2.3 万名受访者。CHARLS 已经公开发布了四期数据，本文所涉及的数据是 2018 年最新的基线追踪数据样本。相较于世界同类项目的数据样本质量和访问应答率，CHARLS 名列前茅，具有较高的学术认可度和可信度。

3.1.2 样本选取

本文的研究样本是满足超过 45 周岁的农村中老年群体且外出务工的子女数量不少于一个条件的个体。在研究子女外出这一行为的过程中，子女选取的是非家户的子女，这样选取的原因具体如下：首先，国民文化思维与经济体系同步变动，在传统形式的家庭架构当中，子女在成年之后依然与父母共同居住的占比率呈现出急速下降的趋势，农村区域父母独居的概率不断提升，如今，在农村区域中，中老年群体与伴侣居住成为主导的居住形式；其次，在数据信息等因素的限制下，CHARLS 数据仅仅统计了非家户子女能够给予父母的陪伴时间以及在经济层面上予以支持的相关信息，这致使家户子女对应的收支信息被包含在家庭生活开支这一指标当中。对此，本文的研究重点是非家户子女出现的外出行为与农村区域父母整体的健康情况之间所存在的影响机制。在 2011 年的基础性数据基础之上，筛选出了 2018 年的最终数据群体当中与标准条件要求相符的样本，因为健康指标、子女给予的经济方面支持等相关数据指标出现了部分缺失的问题，最终进行分析的样本数量为 17398 个，范围涉及到全国的 25 个省区的 98 个市（县）的 237 个村，产出的有效样本数量是 12148 个。

3.1.3 变量描述

本文在模型中选取了诸多控制变量，利用了 CHARLS 数据库中受访人健康状况等方面信息极其丰富的特点。在解释变量的选取上上借鉴刘畅等（2017）的方法，收入效应用外出子女的经济支持总额进行测度。体力劳动时间用于测度外出务工子女对父母照顾缺失后的时间分配效应。由于体力劳动指标不同区间包含的项目不同，体力劳动时间用一天内花多少时间做中等强度的体力活动或者非常消耗体力的激烈活动进行测度。控制变量选取上，本文参考刘畅等（2017）、谢文婷等（2019）的研究，选取父母有无配偶、年龄、性别、去年是否工作、受教育程度来作为控制变量。

同时，结合上面进行的讨论可知，父母之前所呈现的健康情况与子女出现的外出行为、所予以的经济层面上的支持之间所存在的影响机制也在研究

范围中。慢性病的出现往往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基因、饮食、环境等，呈现出迁延不愈等典型特征，子女外出打工等呈现出短期状态的因素一般情况下不会对其产生相应的影响（Böhme et al., 2015），所以，本文将父母患有慢性疾病的数量视为之前健康情况的代理参数。在模型当中，参数设置情况如下表 3 所示。

表 3 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

变量名	描述	CHARLS 编码
外出子女经济支持总额	单位：千元	CE007, CE009
体力活动时间	1=两小时以下； 2=两小时到四小时； 3=四小时以上	OA053, DA055
个人特征		
年龄	单位：岁	BA002, BA004
有配偶	1=有配偶； 0=其他	BE001
性别	1=男； 0=女	rgender
受教育年限	单位：年	BD001
患慢性病个数	单位：个数	DA007
去年工作	1=是； 0=否	FA001

3.2 描述性分析

本节对样本在年龄、性别、婚姻等各方面情况进行了描述性统计。从个体特征来看，样本平均年龄接近 63 岁，其中男性占 47.2%，女性占 52.8%，男女比例基本持平。样本总体的平均学历水平较低，为高中及以下文化水平。婚姻状况方面，大约 14.1% 的受访者未婚、离婚或丧偶， 85.9% 的受访者已婚并与配偶共同居住。工作状态方面，老人基本上未参与工作。劳动时间方面，大部分老人每天体力活动时间为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之间，趋于均等水平。经济支持方面，平均每个留守老人受到来自子女的经济帮助每年 1432 元。从样本个体的慢性病患病个数来看，老年人总体健康水平较好，样本中慢性病平均患病个数为 0.69 个。留守父母自评健康均值为 3，总体处于“好”。如表 4 所示：

表 4 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名	含义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自评健康	个体对当前健康状况的总体评价。1=差；2=一般；3=好；4=很好；5=极好	12148	3.007	1.028	1	5
外出子女经济支持总额	您从外出子女那里收到过多少经济支持。单位：元	17514	1432.75 6	6637.17 2	0	380000
体力劳动时间	一天内花多少时间做中等强度的体力活动或者非常消耗体力的激烈活动。1=两小时以下；2=两小时到四小时；3=四小时以上	17514	0.198	0.399	0	3
年龄	单位：岁	13103	62.594	10.246	45	118
有配偶	1=有配偶；0=其他	13103	0.859	0.348	0	1
性别	1=男；0=女	13103	0.472	0.499	0	1
受教育程度	1=高中及其以下；2=专科；3=本科；4=研究生。	13103	1.013	0.121	1	3
患慢性病个数	您曾患有慢性病的个数。单位：个数	13080	0.693	1.011	0	10
去年工作	您去年是否参加工作。1=是；0=否	13069	0.057	0.231	0	1

3. 3 计量分析

3. 4 计量模型及实证分析

本节将通过构建合理的计量模型来识别子女外出务工对父母健康的影响。本文的实证结果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基础模型回归结果，该部分主要阐述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健康的收入支持效应、时间分配效应。第二部分则在确认子女外出决策会对父母身体健康产生影响的基础上，通过更换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来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三部分区分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样本，进行异质性分析。

本文建立的子女外出务工对父母健康的计量模型如下：

$$\begin{aligned}
 Health_i = & \alpha_0 + \alpha_1 LnIncome_i + \alpha_2 Age_i + \alpha_3 Marry_i \\
 & + \alpha_4 Gender_i + \alpha_5 Edu_i + \alpha_6 Disease_i + \alpha_7 Work_i + \varepsilon_i
 \end{aligned} \tag{1}$$

$$\begin{aligned}
 Health_i = & \beta_0 + \beta_1 Time_i + \beta_2 Age_i + \beta_3 Marry_i \\
 & + \beta_4 Gender_i + \beta_5 Edu_i + \beta_6 Disease_i + \beta_7 Work_i + \varepsilon_i
 \end{aligned} \tag{2}$$

其中, $Health_i$ 表示父母*i*身体健康状况。 $LnIncome_i$ 是关键解释变量父母*i*的外出子女经济支持总额的自然对数, $Time_i$ 是关键解释变量父母*i*的体力劳动时间, Age_i 、 $Marry_i$ 、 $Gender_i$ 、 Edu_i 、 $Disease_i$ 、 $Work_i$ 均为控制变量, 分别为父母*i*的年龄、是否有配偶、性别、受教育程度、曾患慢性病个数、去年是否工作。 α_0 , β_0 为截距项, $\alpha_1 \sim \alpha_7$, $\beta_1 \sim \beta_7$ 为待估系数, ε_i 是随机扰动项。

按照子女外出务工对老人产生的影响途径, 可以分为收入效应和时间效应。结合模型和数据, 收入效应产生的渠道主要为子女外出务工后留守老人得到经济支持, 生活条件得到改善, 活动能力、认知能力等指标趋于健康水平, 同时心理负担得到缓解, 生活质量提升。时间效应产生的渠道为子女出务工后留守老人为了弥补劳动力短缺的缺口, 增加劳动时间, 生活照料上儿女的缺失更多需要自己照顾自己, 导致留守老人身体条件恶化, 精神状态低落, 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3.4.1 模型结果及分析

本文的估计结果如表 5 所示, 模型 (1) 的估计结果显示, 外出子女经济支持对父母的身体健康的影响显著, 并且估计系数为正, 表明外出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提高父母的健康。模型 (2) 的估计结果显示, 体力劳动时间对父母的身体健康的影响显著, 并且估计系数为负, 表明体力劳动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改善父母健康, 子女外出务工, 增加了父母的体力劳动时间, 从而影响了父母健康。比较模型 (1)、(2) 的估计系数, 本文研究发现, 外出务工子女对父母的收入支持效应明显小于外出务工子女对父母生活照料的时间分配效应, 总体上, 子女外出务工不利于父母身体健康。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有无配偶对健康的影响不显著, 可能主要原

因是被解释变量选取比较主观，导致实证估计不准确。因此接下来的稳健性检验中，选取比较客观的总体活动能力、认知水平来衡量健康水平。

表 5 基础模型

	(1) 自评健康	(2) 自评健康
外出子女经济支持总额	0.005** (2.097)	
体力劳动时间		-0.080*** (-4.016)
年龄	0.012*** (12.253)	0.012*** (12.253)
有配偶	-0.012 (-0.403)	-0.026 (-0.890)
男性	-0.178*** (-9.849)	-0.184*** (-10.111)
受教育年限	-0.166** (-2.287)	-0.157** (-2.167)
患慢性病个数	0.267*** (30.468)	0.267*** (30.546)
去年工作	-0.157*** (-4.269)	-0.162*** (-4.407)
常数项	2.327*** (22.615)	2.372*** (23.096)
观测值	12,138	12,138
R ²	0.096	0.097

注：表中显示边际效应；*、**和***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

3. 4. 2 稳健性检验

在已确定子女外出务工产生的收入效应与时间效应会对留守老人身体健康产生影响的情况下，本文将“自评健康”变量替换为“总体活动能力”与“认知水平”，进一步对留守老人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进行深度分析，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当 $Health$ 为总体活动能力，在模型（1）的估计结果显示，外出子女经济支持对父母的身体活动能力的影响显著，并且估计系数为正，表明外出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提高父母的健

康。模型（2）的估计结果显示，体力劳动时间对父母的生体活动能力的影响显著，并且估计系数为负，表明体力劳动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改善父母健康，子女外出务工，增加了父母的体力劳动时间，从而影响了父母健康。比较模型（1）、（2）的估计系数，在活动能力的影响上，外出务工子女对父母的收入支持效应明显小于外出务工子女对父母生活照料的时间分配效应，总体上，子女外出务工不利于父母身体健康。当 $Health_i$ 为认知水平时，在模型（3）的估计结果显示，外出子女经济支持对父母的认知水平的影响显著，并且估计系数为正，表明外出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提高父母的健康。模型（4）的估计结果显示，体力劳动时间对父母的认知水平的影响显著，并且估计系数为负，表明体力劳动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改善父母健康，子女外出务工，增加了父母的体力劳动时间，从而影响了父母健康。比较模型（3）、（4）的估计系数，在认知水平的影响上，外出务工子女对父母的收入支持效应明显小于外出务工子女对父母生活照料的时间分配效应，总体上，子女外出务工不利于父母身体健康。因此无论是在“总体活动能力”还是在“认知水平”的测度上，都与“自评健康”产生的结果相似，即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后对父母生活照料的减少对父母的心身健康呈现负向影响，而外出子女的经济支持作为一种收入转移对父母的心身健康有正向影响；总体上，子女外出务工对父母健康的总效应为负。此外，当被解释变量为比较客观的总体活动能力、认知水平时，有无配偶对健康的影响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有配偶对健康产生积极效应。

本文也同时把外出子女经济支持总额和体力劳动时间，在控制信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放入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估计，并与收入和时间两个变量单独放入回归模型做比较分析，研究证实，和基础回归结果一致，外出子女时间效应对其父母健康水平的负效应远远超过了因子女外出务工收入效应导致对父母收入提高所产生的正效应，总体上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老人的健康状况产生了负面影响，

表 6 稳健性检验

	(1)	(2)	(3)	(4)	(5)
	总体活动能力	总体活动能力	认知水平	认知水平	自评健康
外出子女经济支持总额	0.059*** (7.099)		0.030*** (6.474)		0.005** (2.230)
体力劳动时间		-0.608*** (-9.436)		-0.154*** (-4.070)	-0.081*** (-4.089)
年龄	-0.033*** (-8.783)	-0.028*** (-7.593)	-0.072*** (-40.492)	-0.071*** (-20.758)	0.012*** (11.888)
有配偶	0.834*** (7.850)	0.672*** (6.454)	0.490*** (10.097)	0.461*** (4.844)	-0.012 (-0.387)
性别	-0.099 (-1.596)	-0.049 (-0.785)	0.330*** (9.457)	0.380*** (6.363)	-0.185*** (-10.148)
受教育年限	-0.165 (-0.642)	-0.253 (-0.991)	1.335*** (8.945)	1.230*** (4.409)	-0.156** (-2.149)
患慢性病个数	-0.203*** (-5.557)	-0.200*** (-5.498)	-0.016 (-0.973)	0.032 (1.047)	0.267*** (30.505)
去年工作	0.475*** (4.208)	0.491*** (4.348)	0.053 (0.718)	0.177* (1.827)	-0.161*** (-4.368)
常数项	15.610*** (41.492)	15.500*** (41.272)	4.829*** (23.836)	5.217*** (13.421)	2.361*** (22.974)
观测值	13,067	13,067	13,062	4,786	12,138
R ²	0.027	0.029	0.153	0.105	0.097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

3.4.3 异质性分析

本文以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三个不同的指标对比分析了样本父母群体，研究了特征各异的父母与子女外出务工行为之间的影响作用，这在一定

程度上强化了群体自身的差异性特征，同时能够助力未来社会保障体系相关政策的制定。

表 7 为父母年龄的分组回归结果。总体上，中年父母和老年父母的身体状况均受来着外出子女产生时间效应的负面影响，子女外出务工导致对父母生活照料时间减少、家庭劳动力减少会对父母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老年留守老人相比于中年留守老人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加显著。从子女经济支持来看，收入代际转移对老年群体产生积极影响，而中年留守老人对收入效应产生的影响不敏感，产生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中年群体具备一定的生产能力，积蓄也较多，对资金的援助还不迫切，老年群体收入较中年父母更低，在流动性上也会受到更大的限制。总之，无论是时间还是收入的代际转移，老年群体的健康状况受到子女外出务工的影响更为强烈。

本研究也发现有无配偶对 60 岁以上农村留守老人的健康具有负向显著影响，这可能的原因是年龄大的农村留守老人，如果又有老伴需要生活照料，需要子女照顾的时间更多，且由于经济支持的收入效应小于生活照料缺失的时间效应，因此，有无配偶对 60 岁以上的农村留守老人的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表 7 异质性分析：年龄

	(1) 45~60 岁	(2) 60 岁以上	(3) 45~60 岁	(4) 60 岁以上
外出子女经济支持总额	0.000 (0.068)	0.009*** (2.861)		
体力劳动时间			-0.078*** (-2.740)	-0.091*** (-3.309)
有配偶	-0.117 (-1.631)	-0.042 (-1.304)	-0.117 (-1.644)	-0.068** (-2.226)
性别	-0.200*** (-7.458)	-0.152*** (-6.172)	-0.207*** (-7.704)	-0.153*** (-6.203)
受教育年限	-0.329*** (-2.739)	-0.039 (-0.426)	-0.313*** (-2.601)	-0.035 (-0.377)
患慢性病个数	0.312*** (22.594)	0.236*** (21.038)	0.313*** (22.648)	0.237*** (21.087)

去年工作	-0.062 (-1.351)	-0.340*** (-5.723)	-0.067 (-1.456)	-0.346*** (-5.842)
常数项	3.217*** (22.674)	3.078*** (31.515)	3.227*** (22.977)	3.147*** (32.712)
观测值	5,421	6,717	5,421	6,717
R ²	0.094	0.072	0.096	0.072

在以性别分组的回归结果中，子女外出行为产生的收入效应对男性产生积极影响，而对女性留守老人无影响，这可能与男性在饮食上天然较女性需求更多有关（如：肉食、主食、茶叶等），而女性勤俭持家的天性对收入并不敏感。子女外出行为产生的时间效应对留守老人均产生负面影响，女性产生的负面影响较男性更大，这可能与女性传统家庭地位有关，“女主内”要求女性包揽洗衣做饭等家务劳动，必要时要辅助男性完成务农的任务，而且女性对照顾后代有天然的母性特征，较为沉重的体力劳动对女性身体健康造成了更大的伤害，因而更需要子女的照顾。同时，有无配偶对农村留守男性健康产生积极影响，对农村留守女性健康产生消极影响，原因可能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影响，农村地区男性的家庭地位较高，男权思想比较严重，农村留守老人中，大多是女性照顾男性的日常生活，比如做饭等家务事情，女性承担更多的家庭琐事，导致有无配偶对农村留守男性老人的健康产生有利影响，而对农村留守女性老人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如表 8 所示：

表 8 异质性分析：性别

	(1) 男性	(2) 女性	(3) 男性	(4) 女性
外出子女经济支持总额	0.008** (2.129)	0.001 (0.265)		
体力劳动时间			-0.063** (-2.072)	-0.093*** (-3.595)
年龄	0.015*** (10.494)	0.009*** (6.641)	0.016*** (10.972)	0.009*** (6.313)
有配偶	0.119** (2.379)	-0.108*** (-2.813)	0.105** (2.130)	-0.111*** (-3.051)
受教育年限	-0.135* (-1.777)	-0.485** (-1.980)	-0.128* (-1.684)	-0.478** (-1.989)
患慢性病个数	0.288*** (22.285)	0.248*** (20.938)	0.289*** (22.379)	0.248*** (20.947)
去年工作	-0.098* (-0.098*)	-0.203*** (-0.203***)	-0.102* (-0.102*)	-0.209*** (-0.209***)

	(-1.810)	(-4.073)	(-1.868)	(-4.217)
常数项	1.784*** (13.423)	2.943*** (10.878)	1.798*** (13.543)	2.997*** (11.280)
观测值	5,719	6,419	5,719	6,419
R ²	0.102	0.081	0.102	0.083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

教育年限是影响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因素，许多国家在各个时期对健康的研究中都发现文化教育水平对健康的正向改善作用（Marmot et al., 1984; Meara et al., 2008; Kunst and Mackenbach, 1994;）。在教育阶段进行分组后，教育水平较低的父母的健康状况受到来自子女经济支持的影响显著，而高教育组父母没有影响，这可能与学历越高的父母越能够在拮据的生活合理支配收入有关；体力劳动对不同学历老人均产生负面影响，且学历越高受到负面影响越大。本文认为在 2018 年 45 岁老人已处于七十年代左右，教育普及率提高，但是由于受教育程度为本科的样本极少，回归结果估计不准确，因此本研究未进行讨论。如表 9 所示：

表 9 异质性分析：受教育程度

	(1) 高中及其以下	(2) 专科	(3) 高中及其以下	(4) 专科
ln 外出子女经济支持总额	0.005** (2.054)	0.001 (0.033)		
体力劳动时间			-0.076*** (-3.783)	-0.091*** (-3.309)
年龄	0.012*** (11.996)	0.015 (1.591)	0.012*** (12.011)	-0.068** (-2.226)
有配偶	-0.014 (-0.468)	0.253 (0.607)	-0.028 (-0.949)	-0.153*** (-6.203)
性别	-0.180*** (-9.912)	0.235 (0.872)	-0.185*** (-10.159)	-0.035 (-0.377)
患慢性病个数	0.267*** (30.471)	0.208** (2.054)	0.268*** (30.536)	0.237*** (21.087)
去年工作	-0.154*** (-4.185)	-0.277*** (-7.466)	-0.159*** (-4.315)	-0.346*** (-5.842)
常数项	2.173***	1.226*	2.225***	3.147***

	(28.967)	(1.656)	(29.489)	(32.712)
观测值	11,979	150	11,979	6,717
R ²	0.095	0.117	0.096	0.072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由于受教育程度为本科的样本极少，回归结果估计不准确，因此本研究未进行讨论。

3.4.4 总效应

在衡量子女外出对父母健康影响的总效应时，我们采用将基本模型回归系数标准化处理的方法比较两种代际转移方式（即子女对父母的时间照料和经济支持）对父母健康水平作用的相对大小。以表 6 基本模型中的认知为例，经济支持的标准化系数为 0.03，时间效应的标准化系数为 -0.154。因此，子女产生的时间效应的作用效果更强。将表 5 的分组总效应结果与表 6~9 中相应分组回归结果进行比对，可以发现表 5 与分组回归结果保持一致，再次证实了子女外出务工行为对父母健康的总效应取决于时间和收入两种代际转移的相对大小。我们发现外出子女时间效应对其父母健康水平的负效应超过了因子女外出务工收入效应导致对父母收入提高所产生的正效应。这与 Huang 等（2016）基于中国的研究发现子女外出对父母健康的总效应为负结果相似。

4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本文使用 CHARLS 数据，在“时间效应”与“收入效益”两条代际转移路径下对农村父母健康在子女外出务工后作何反应进行了研究。研究结论有以下三点：第一，子女外出务工后产生的收入效应对留守老人在心理和身体上均产生积极影响。第二，子女外出务工后产生的时间效应对留守老人在心理和身体产生负面影响。第三，总体来说，收入效应与时间效应叠加的总效应为负，即在身体和心理两个方面，收入效应带来的经济上的支持产生的积极效应均抵消了由于时间效应带来在生活照料上的缺失产生的负面效应。无论是面对代际转移产生的收入效应和时间效应，农村留守老人都显得十分敏感，这与本文在背景中阐述的内容契合：留守老人作为老龄人口中的健康敏感群体，健康状态容易受到影响。此外，由于性别带来的影响，男性身体条件的自然优势导致男性留守老人身体忍耐度更强，受到时间效应带来的身体健康的影响较女性更小；同时女性勤俭持家的特质导致对收入效应带来的正向支持不敏感。子女外出务工后产生的时间效应对留守老人健康均产生负面影响，无明显组间差异。

从总体上看，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老人的健康状况有负面影响。在我国农村地区，绝大部分老人文化水平很低甚至文盲，大部分没有收入，受教育年限越少、经济水平较差的老年父母，受到子女家庭养老缺位的负面影响更大，父母心理健康受到子女外出务工的冲击也更为严重。特别是从 2019 年末开始，我国已离老龄化社会只有一步之遥，老龄人口却“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在我国农村地区，家庭结构代际缺失导致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削弱，老年抚养比随着历年农村出生人口减少持续上升，现实问题难以解决导致农村子女相比于城镇子女的家庭负担沉重得多。因此，社会各界的关注点应该聚于农村老年群体，改善农村老人健康问题是当前我国养老工作的重中之重。

4.2 政策建议

研究表明农村社会原有的家庭养老功能在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后一定程度上被弱化，降低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质量，进一步凸显农村社区的老年健康问题。在中国向城镇化和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农村地区不得不牺牲其发展，大量的社会问题也由此出现。农村老年人作为脆弱群体毫无疑问是最容易受到冲击的群体之一，社会各界也越来越重视农村养老问题。农村留守老人现象不是由单一的社会变化出现的，而是我国劳动力转移、人口老龄化、城镇化中出现的交叉问题。中国的社会经济还处于不发达不均衡的阶段，快速的经济发展阶段必将导致农村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留守老人这一群体还将大规模存在。与此同时，对养老的需求已不是过去吃饱穿暖，由简单的生存需求转向多元需求。在与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不断冲击下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的家庭人口不断减少，满足农村老人日益增长的多元需求对小型化家庭来说是一种挑战，农村社会传统秩序毫无疑问受到冲击。在关注民生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道上农村留守老人问题是现代化发展进程重要内容。本文认为，面对城镇净流入人口持续增加的现状，政府应当加大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力度，以应对日益凸显的农村老人问题。为农村留守老人解忧，进一步提高农村留守老人生活质量是贯彻党的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着力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针对现状以及研究结论出现的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4.2.1 改善和巩固农村经济发展能力

一是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升农民经济实力。十九大报告指出“促进农民工就业和创业回归”。农村留守老人健康问题的根源是贫困。外出务工的动机也来源于解决家庭收入问题，解决农村留守老人问题就是要发展农业经济，让工业对农业、城市对农村的反哺支持力度，农村贫困的消除就是为家庭养老奠定经济基础。二是促进农业产业化，拓宽农民就地工作渠道。农村留守老人表现出的身体和心理问题主要是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农村青壮年

劳动力不断向城市流动所致。各级政府要发挥当地优势，因地制宜，积极引导当地发展产业化，资金与科技要齐头并进，让离乡和在乡的农村人口都有机会在当地就业，留下来就是为家庭养老提供了人力资源。在农业产业化发展扩大农民收入水平的同时，不仅要为农村劳动力创造就业条件，还要为农村留守老人在生活上提供便利。三是引导城市、个人资金投入农村经济发展。农村产业的发展不仅要政府的支持，还需要社会力量的扶持和建设才能实现市场化，鼓励城市资本下乡，打造特色农业，如猪圈咖啡，花园火锅等产业，激活服务业，带动当地就业，提升农业层次，市场化是农业实现增收的重要路径。

4.2.2 健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动员社会各界发挥自我优势，整合闲置医疗资源，成立志愿团队为养老服务添砖加瓦，始终坚持政府主导与市场紧密结合的路线，“时间效应”产生的缺失可以由社会功能来弥补，要形成与市场经济相协调、相适应的运行体系。一是重视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为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业吸引社会资金、人员及管理经验发展，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业的服务领域和服务项目要适应老人的新变化，促进农村居家养老实现现代化服务；积极探索将市场化有偿服务、志愿者公益服务、政府购买服务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倾斜的角度。二是着力完善农村养老服务。社区力量与老年人日常活动状态息息相关，特别是女性老年人更需要帮助，因此要壮大社区力量逐步向联合性、跨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转变，加大农村敬老院、医疗中心、老年俱乐部、女性老年人康养中心等农村社区养老设施建设的投入，向农村留守老年人提供身体检测、养老保健、娱乐休闲等服务。重视农村老人文化水平的提高，提高老年人健康意识和个人素质能力的提升，要在农村开展健康课堂、基础知识教育、家庭关系处理等方面的知识传播活动。三是推动发展机构养老服务。建立供养、医疗、养护大数据平台，整合机构资源，提升养老服务层次。政府和有关部门加强引导消除政策障碍，对民间和社会资金投入提供政策支持，资金支持要配合政策支持，促进社会养老服务机构多元化，养老服务社会化发展。此外，2020年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之年，目前我

国的扶贫瞄准机制还是以收入为导向的，从关注经济贫困到多元贫困还有一段距离，扶贫对象的瞄准和选择没有对身心健康相关的指标和信息进行观察，要认识到健康是人类生存的根本，对农户摆脱贫困具有积极的作用，因此扶贫工作的目标应将老人身体脱贫纳入其中。

4. 2. 3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逐步解决农村留守老人养老、医疗、保险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完善的农村老年人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水平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同步提高。一是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在面对当前农村养老服务需求和农村养老保障出现的新变化，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应研究新形势，认真制定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拓宽新农保筹资渠道，逐步实现对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的全面覆盖。二是完善农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范围进行拓大，加强农村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要普及农村商业健康保险。三是增加农村老人社会救济的投入。重新界定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将更多的农村老人纳入到低保范围中去。加大对“伤残病贫”的医疗救助。四是完善农村社会福利制度。优化农村留守老人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要能满足大多数农村留守老人，特别是对单亲老人、女性老年人、极度贫困老人要提高关怀力度，提高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福利水平。农村建设养老基地的措施是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为农村养老资金引流，同时向农村养老服务投入是各级政府财政性资金的重要投向。

4. 2. 4 提高社会政策落实力度

一是城市入户政策加速完善，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的通知》。政策支持要落地，基层人员提高办事效率，要与群众站在一起。二是城市的医疗配套体系应当平视随迁老人。放宽户籍政策是首要的工作，同时要在养老健康经费上加强投入，从而使满足人口流入地养老水平不受影响。三是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健康养老教育活动，生命健康课堂要引入到社区、小组、单位中，在各高校的选修课程中加

入传统礼教、尊老爱老课程，提高人民素养，弘扬社会中爱老敬老的好人好事，让社会中充满尊重老人，善待老人的良好氛围。

参考文献

- [1]Antman, F. M., 2010, “Adult Child Migration and the Health of Elderly Parents Left Behind in Mexico”,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00, pp.205~208.
- [2]Attias-Donfut, C., Ogg, J., Wolff, F.-C., 2005, “Europe—an Patterns of Intergenerational Financial and Time Transfers”, European Journal of Ageing, Vol.2, pp.161~173.
- [3]Adhikari, R., Jampaklay, A., Chamratrithirong, A., 2011, “Impact of Children's Migration on Health and Health CareSeeking Behavior of Elderly Left Behind”, BMC Public Health, Vol.11, pp.143~150.
- [4]Adrain, J. and Daniel, R., 1976, “Impact of Socioeco-nomic Factors on Consumption of Selected Food Nutrients in the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 (58) ,pp.31~38.
- [5]Benjamin, Dwayne; Brandt, Loren and Rozelle, Scott: Aging, Well-being and Social Security in Rural North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26, 89-116, 2000.
- [6]Böhme, M.H., Persian, R., Stöhr, T., 2015, “Alone But Better Off? Adult Child Migration and Health of Elderly Parents in Moldova”,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Vol.39, pp.211~227.
- [7]Campolieti, M., Goldenberg, J., 2007, “Disability Insurance Denial Rates and th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of Older Men and Women in Canada”, Atlantic Economic Journal, Vol.35, pp.59~75.
- [8]Cong,Z and M .Silverstein,“intergenerational Exchange Between Parents and Migrant and Nonmigrant Sons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2011,73(1),93-104.
- [9]Cheng, T. O. (2013). China's little emperors: medical consequences of China's one-child emerger, S.,& Li, S. (2013).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rural

- employment patterns: Evidence from China. Labor Market Issues in China,31.
- [10]Disney, R., Emmerson, C., Wakefield, M., 2006, “Ill Health and Retirement in Britain: A Panel Data- Based Analysis”,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Vol.25, pp.621~649.
- [11]David L, Simla T, and Maximo T, Long-Term Drivers of Food and Nutrition Security, FOODSECURE working paper06, Feb, 2013.
- [12]Du, Y., Park, A., Wang, S., 2005, “Migration and Rural Poverty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33, pp.688~709.
- [13]Ellekjaer, H., Holmen, J., Vatten, L., 2001, “Blood Pressure, Smoking and Body Mass in Relation to Mortality from Stroke and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n the Elderly. A 10- year Follow-Up in Norway”, Blood Pressure, Vol.10, pp.156~163.
- [14]Eric, B., 2007, “How Do Middle-Aged Children Allocate Time and Money Transfers to Their Older Parents in Europe?”, Empirica, Vol.34, pp.171~188.
- [15]Franzini L., Caughy M., Spears W. et al. Neighborhood Economic Conditions, Social Processes and Self-Assessed Health in Low-Income Neighborhoods in Texas: A Multilevel Latent Variables Model [J].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2004(61):788-804.
- [16]Frank, R., Palma-Coca, O., Rauda-Esquivel, J., OlaizFernández, G., Díaz-Olavarrieta, C., Acevedo-García, D., 200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mittances and Health Care Provision in Mexico”,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Vol.99, pp.1227~1231.
- [17]Gassmann F., Siegel M., Vanore M. et al. The Impact of Migration on Children Left Behind in Moldova [G]. UNU-MERIT Working Paper Series, 2013.
- [18]Huang, B., Lian, Y., Li, W., 2016, “How Far is Chinese Left-behind Parents’ Health Left Behind?”,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37, pp.15~26.

- [19]Hu, F. (2012).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children's high school attendance: The case of rural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32(3), 401-411.
- [20]Hu, X.(2012).China's "New Generation" Rural-Urban Migrants: Migration Motivation and Migration Patterns.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 [21]Hadi, A., 1999, "Overseas Migration and the Well-Being of Those Left Behind in Rural Communities of Bangladesh", *Asia-Pacific Population Journal / United Nations*, Vol.14, pp.43~ 58.
- [22]He, C., Ye, J., 2014, "Lonely Sunsets: Impacts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on the Left-behind Elderly in Rural China", *Population Space & Place*, Vol.20, pp.352~369.
- [23]He, G., Xie, J.-f., Zhou, J.-d., Zhong, Z.-q., Qin, C.-x., Ding, S.-q., 2016, "Depression in Left-behind Elderly in Rural China: Prevalence and Associated Factors", *Geriatrics & Gerontology International*, Vol.16, pp.638~643.
- [24]Huang, K.S., 1999, EffectsofFoodPricesandConsumerIncomeonNutrientAvailability, *AppliedEconomics*, 31, 367 ~380.
- [25]Hugo,G.“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n the family in Indonesia ”.APN workshop on migration and the family in a globalizing word.2001.
- [26]Idler E. L., Hudson S. V., Leventhal H. The Meanings of Self-Ratings of Health: A Qualitative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 [J]. *Research on Aging*, 1999(21):458–476.
- [27]John Giles、牧人: 《农村传统养老机制与成年子女外出劳动就业》,《中国劳动经济学》2005 年第 4 期。
- [28]Giles, J., Mu, R., 2007, "Elderly Parent Health and the Migration Decisions of Adult Children: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Demography*, Vol.44, pp.265~288.
- [29]Kuhn R., Everett B., Silvey. The Effects of Children's Migration on Elderly Kin's Health: A Counterfactual Approach [J]. *Demography*, 2011 (1):183-209.

- [30]Katz J. N., Punnett L., Simmons B. P. et al. Depressive Symptoms in Late Life: A 10-yearfollow-up [J]. Archives of Gerontology And Geriatrics, 2004, 38(3): 239—250.
- [31]Kalmijn, S., Curb, J. D., Rodriguez, B. L., Yano, K., Ab-bott, R. D., 1999, “The Association of Body Weight and Anthro-pometry with Mortality in Elderly Men: The Honolulu Heart Pro-gra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besity & Related Metabolic Dis-orders, Vol.23, pp.395.
- [32]Knodel, J. , Kespichayawattana, J. , Saengtienchai, C. and Wiwatwanich, S. 2010. How Left Behind are Rural Parents of Migrant Children? Evidence from Thailand. Ageing and Society 5: 811-841.
- [33]Kaneda, Toshiko.A Critical Window for Policy making on Population Aging Developing Countries.<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Janury.
- [34]Lu, Y., 2012, “Household Migration, Social Support and Psychosocial Health: The Perspective from Migrant- Sending Area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Vol.74, pp.135~142.
- [35]Mallee, H., 2000, “Agricultural Labour and Rural Popu-lation Mobility: Some Observations”, In: Rural Labor Flows in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34~66.
- [36]Pitt, M., 1983, “Food Preference and Nutrition in RuralBangladesh”,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 (65) ,pp.105~114.
- [37]Song S, Tan J, Miao Y, et al. Crosstalk of autophagy and apoptosis: Involvement of the dual role of autophagy under ER stress[J]. J CellPhysiol, 2017; 232(11) : 2977-84.
- [38]Strauss John. Joint determination of food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in rural Sierra Leone: Estimates of a household-firm model[J]. North-Holland,1984,14(1).
- [39]Skeldon,Ronald.Ageing of Rural Population in South East and East Asia,Manhidol University Thailand.
- [40]Staiger, D., Stock, J. H., 1997, “Instrumental Variables Regression with Weak Instruments”, Economet-rica, Vol.65, pp.557~586.

- [41]Thomson H. A Dose of Realism for Healthy Urban Policy:Lessons from Area-based Initiatives in the UK [J].Journalof Epidemiology and Community Health, 2008 (10) .
- [42]Vendryes, T. (2011). Migration constraints and development: Hukou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2(4), 669-692.
- [43]Vulletari J,King R.'Does your Granny Eat Grass?'Mass Migration,Care DrainAnd the Fate of Older People in Rural Albania[J]Global Networks,2008,8(2):139-171.
- [44]Wu, Y., Huxley, R., Li, L., Anna, V., Xie, G., Yao, C., Woodward, M., Li, X., Chalmers, J., Gao, R., Kong, L., Yang, X., 2008, "Prevalence, Awareness, Treatment and Control of Hypertension in China: Data from the China National Nutrition and Health Survey 2002", Circulation, Vol.118, pp.2679~2686.
- [45]Xie, J.-f., Ding, S.-q., Zhong, Z.-q., Yi, Q.-f., Zeng, S.-n., Hu, J.-h., Zhou, J.-d., 2014, "Mental Health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nfluencing Quality of Life in Elderly Left Behind When Families Migrate Out of Rural China", Revista Latino- Americana De Enfermagem, Vol.22, pp.364~370.
- [46]Zuniga Elena,Daniel Hernandez.1994 impirancia de los Hijos en la Vejez y Cambios en el Comportamiento Reproductivo Estudios Demograficos y Urbanos.
- [47]Zimmer Z.A Comparative Study of Migrant Interaction with Elderly Parents in Rural Cambodia and Thailand[R].Presented at the 2007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Annual Meetings in New York,2007-04-29.
- [48]白南生、李靖、陈晨。子女外出务工、转移收入与农村老人农业劳动供给——基于安徽省劳动力输出集中地三个村的研究 [J] , 中国农村经济, 2007 (7) : 4 6-5 2。
- [49]畅红琴、董晓媛, 中国农村劳动力外流对留守家庭成员时间分配的影响 [J], 世界经济文汇,2009(04):63-76。
- [50]段成荣、吕利丹、郭静等,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生存和发展基本状况: 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人口学刊, 2013 (3) 。

- [51]杜鹏等：《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的影响》，《人口研究》2004年第6期。
- [52]贺聪志、叶敬忠，农村留守老人研究综述[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24-34。
- [53]路雅文、张正河，1978—2016年农村人口迁移的社会网络分析:来自中部人口流出大省C村的证据[J],农村经济问题（季刊），2018(3)。
- [54]李钟帅、苏群，父母外出务工与留守儿童健康一来自中国农村的证据[J]，人口与经济，2014（3）。
- [55]李强，大国空村农村留守儿童、妇女与老人，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5）。
- [56]刘晓昀：《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农村经济，2010年第9期。
- [57]刘美萍.社区养老：农村空巢老人养老的主导模式浙江社会科学，2010（1）：49-53。
- [58]刘宏、高松、王俊：《养老模式对健康的影响》，《经济研究》，2011年第4期。
- [59]刘畅,易福金,徐志刚.父母健康:金钱和时间孰轻孰重?——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影响的再审视[J].管理世界,2017(07):74-87。
- [60]卢姿潼，子女外出务工与留守老人健康：是经济支持还是代际缺失？[J].统计与管理,2019(04):110-117。
- [61]卢海阳、钱文荣：“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的影响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14年第6期，第24-32页。
- [62]罗敏,姜倩,张菊英,谭玲,应桂英,甘华平.农村留守老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研究[J].四川大学学报(医学版),2011,42(03):409-412。
- [63]罗芳、彭代彦：“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空巢’家庭养老影响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7年第6期，21-27页。
- [64]李琴、孙良媛，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基于“时间效应”和“收入效应”[J]，学术研究,2011(04):85-89。
- [65]穆光宗，1999，家庭养老面临的挑战以及社会对策问题，中州学刊（1）：64-67。

- [66]潘璐、叶敬忠, 农村留守儿童研究综述[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 (2)。
- [67]庞丽华、Scott Rozelle、Alan de Brauw., 中国农村老人的劳动供给研究[J], 经济学(季刊),2003(02):721-730。
- [68]宋月萍, “精神赡养还是经济支持: 外出务工子女养老行为对农村留守老人健康影响探析”, 《人口与发展》, 2014年第4期, 第37-44页。
- [69]邵德兴, 浙江农村空巢老人帮扶服务体系实证研究浙江社会科学, 2011 (9) :86-93。
- [70]孙鹃娟, 劳动力迁移过程中的农村留守老人照料问题研究[J], 人口学刊,2006(04):14-18。
- [71]孙文凯、王乙杰, 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健康的影响: 基于微观面板数据的再考察[J], 经济学 (季刊) , 2016 (3)。
- [72]王阳、宋周,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因素研究[J], 农村经济,2017(09):121-128。
- [73]王萍、李树苗: 《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纵向分析》, 《人口研究》, 2011年第1期。
- [74]王小龙、兰永生: 《劳动力转移、留守老人健康与农村养老服务供给》, 《南开经济研究》, 2011年第4期。
- [75]王全胜: “农村留守老人问题初探”, 《学习论坛》, 2007年第1期。
- [76]熊跃根, 中国城市家庭的代际关系与老人照顾[J], 中国人口科学, 1998, (6) : 16~22。
- [77]姚远, 中国家庭养老研究述评[J], 人口与经济, 2001, (1) : 33~43。
- [78]姚远, 非正式支持理论与研究综述[J], 中国人口科学, 2003, (1) : 69~74。
- [79]闫萍, 农村子女外流对父母经济供养状况的影响分析[J], 西北人口,2007(05):21-24。
- [80]杨舒, 人口移出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失能老年人“居家扶助型”养老模式研究[D], 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8。
- [81]郑磊, 从农民社会走向市民社会的俄国之镜[J], 西部大开发,2013(08):125。

- [82]杨舒, 人口移出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失能老年人“居家扶助型”养老模式研究[D], 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8。
- [83]张新梅, 家庭养老研究的理论背景和假设推导[J], 口学刊, 1999, (1) : 58~61。
- [84]詹鸣, 尹晖, 罗辉, 钟卫军, 史千山. 流动人口信息流管理模式初探[J], 人口研究, 2006(05):87-90。
- [85]左冬梅、李树苗、吴正, 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交换的年龄发展轨迹——成年子女角度的研究[J], 当代经济科学, 2012, 34 (4) : 26~34。
- [86]张驰,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子女赡养行为及父母健康福利影响研究[D],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0。

致谢

时光荏苒，两年的硕士学习生涯转瞬即逝。在这段宝贵的时光里，我收获了诸多良师益友，这段经历也会成为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在此，我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导师毛中根老师。从硕士阶段认识老师的第一天起，老师既是我学术道路上的引领者，又是生活中的朋友。老师不但在生活中关心照顾我，在我迷茫的时候鼓励自己走心仪的的道路，在论文的开题、选题、初稿阶段更是凝聚了老师辛勤的汗水，让我颇受启发，受益匪浅。除此之外，感谢两年之内在学业上和生活里给予我莫大帮助的其他老师们，我将会永远铭记各位老师对我的教导，怀着希望和憧憬走向新的人生旅途。

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是他们全力支持我的理想，让我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地选择自己喜欢的道路，在我遭受挫折的时候，放弃失望的时候，是他们，作为我的精神支撑，给我鼓励，让我振作，一次次重新站起来继续前行。

最后，感谢亲爱的同学们。我们在美丽的成都相遇，在这个幸福的天府之国共同度过两年的时光，谢谢大家对我的包容和接纳，每一个可爱、真诚的你，都是一段美好的回忆。虽然即将离别，万水千山，道一句珍重。



經世濟民
致致以求

西南財經大學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校址：四川成都温江柳台大道555号
电话：028-87092032 传真：028-87092632
邮编：611130
网址：<http://www.swufe.edu.cn>
Address: Liulin Campus (Main Campus): 555, Liutai Avenue,
Wenjiang District, Chengdu, Sichuan, P. R. China
Tel: 86-28-87092032 Fax: 86-28-87092632 Postcode: 611130